

五卅运动中的中共早期领导人

·刘朝晖·

1925年1月党的四大之后，工人阶级的反帝运动迅速发展，五卅运动就是在这一背景下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以工人阶级为主力军的中国人民反帝、反军阀势力的一场大规模革命运动。

作为运动中心城市的上海工人大罢工之所以走在全国的前列，这与李立三、蔡和森以及刘少奇这三位中共早期领导人的贡献是分不开的。

李立三：组织“三罢”工运策略果决

1925年2月初，上海沪西区内棉八厂发生了日本监工野蛮殴打中国女工，并无故开除粗纱车间50多个男工的事件，引起工人们的强烈不满，并举行了抗议罢工。

刚刚参加了中共四大并当选为中央委员的李立三得知情况后，随即到内外棉八厂调查。通过广泛接触工人，了解到许多日本监工野蛮迫害工人的罪证，向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委作了详细汇报。

根据党的指示，李立三和上海大学的杨之华、郭伯和、刘华等人组成了罢工委员会，领导工人大罢工。经过李立三的动员，大家情绪振奋而昂扬，一致通过了罢工决议，并推选李立三为罢工委员会主席。1925年2月10日，罢工委员会在闸北潭子湾召开工人群众大会，李立三身穿蓝布长衫，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说，历数了工人的深重苦难，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种种罪行，激起了广大工人的极大义愤。在李立三等领导下，沪西工人罢工浪潮席卷了11个棉纱厂。

作为新成立的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李立三在五卅运动中展现出非凡的组织才能。他深入小沙渡、杨树浦等工业区，将分散的工人力量凝聚成统一战线，短短时间内使上海总工会会员激增到21万人，其中纱厂工人占比达57%。5月28日党中央紧急会议上，他力主“把工人的经济斗争转变为反帝政治斗争”，直接推动了5月30日反帝大示威的举行。面对帝国主义的武力镇压，他果断提出“罢工、罢课、罢市”的“三罢”策略，使运动从单一的工人抗议升级为全民反帝浪潮。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邵雍指出，李立三在“三罢”斗争中创造性地将工人罢工与学生罢课、商人罢市有机结合，形成“以工促学、以学促商”的联动机制，这种多维度动员策略成为中共早期城市斗争的经典范式。

在李立三的支持下，中共中央还于1925年6月创办了第一份日报《热血日报》，由瞿秋白任主编。《热血日报》每日销

量达三万份，成为“五卅运动的舆论先锋”。

上海社科院研究员熊月之评价：“《热血日报》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掌握现代传媒工具，其传播力使反帝理念突破地域限制，成为全国性的政治动员武器。”

同济大学博士后徐迟通过研究公共租界警务处档案发现，《热血日报》的发行使租界当局陷入舆论被动，工部局董事会因低估中共宣传能力，误判运动形势，客观上为党组织争取了发展空间。

蔡和森：将理论与中国斗争实践结合

1921年入党后留在党中央工作的蔡和森，是五卅运动的重要战略设计者。在1925年5月28日的党中央会议上，他全面分析了当时上海工人运动的形势，敏锐抓住“工部局审讯被捕学生”的契机，提出：“现在要把工人的经济斗争与目前正在蓬勃发展的反帝斗争汇合起来，要使工人斗争表现明显的反帝性质，以争取一切反帝力量的援助。同时也使工人加入总的反帝战线而成为这一战线的中坚。”他还建议：“5月30日组织反帝大示威，把学生、工人、市民的力量拧成一股绳。”这一建议成为运动爆发的关键节点。

1925年5月30日下午，蔡和森随着人群，来到南京路发表演讲，散发传单。在五卅惨案发生当天深夜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上，蔡和森提出了号召全上海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屠杀的策略主张。会议接受了蔡和森的建议。并决定组成由蔡和森、李立三、瞿秋白参加的党的行动委员会，直接领导上海政治斗争。

在党的指引下，6月1日，上海20万工人大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形成了“三罢”高潮。当晚，中共中央再次举行会议，蔡和森在会上进一步提出了新的策略主张：“在上海应当马上成立工商学联合会，成为这一反帝运动总的公开指挥机构，以巩固和发展这一运动，进行长期的斗争；同时要马上把运动扩大到全国去。”

当“三罢”斗争遭遇资产阶级动摇时，蔡和森及时指出“必须坚持工人阶级的领导权，联合中小资产阶级，孤立大资产阶级”，为运动后期策略调整提供了理论支撑。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胡新民曾评价：“蔡和森的贡献在于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与中国反帝实践相结合，使五卅运动超越了地域性抗议，成为具有全国意义



内外棉纱厂等工人举行示威游行

的民族革命开端。”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杨德山强调，蔡和森提出的“工人阶级领导权”理论，不仅指导了五卅运动的具体实践，更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重要源头，为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提供了早期探索。

蔡和森不仅是理论家，更是实干家。在他指导下，沪西工友俱乐部成为培养工运骨干的摇篮，仅1925年6月就发展党员183人，占同期上海新党员的55%。他提出的“把口号变成行动，把行动变成纪律”的动员原则，至今仍是群众工作的重要方法。

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忻平在分析五卅精神时指出，蔡和森的群众动员实践体现了“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他将抽象的革命理论转化为工人群众可感知的斗争目标，这种“接地气”的工作方法为党的群众路



学生示威游行

线形成提供了实践样本。

刘少奇：创新治理工会保障工人生活

刘少奇1925年到上海时，正值上海内外棉各厂工人罢工，工人与资本家的斗争正处于高潮。刘少奇坚决执行党中央的决定，为“五卅”反帝大示威四处奔波，做了大量的十分艰巨的组织和准备工作。上海总工会成立后，刘少奇被选举为总务科长，和李立三等人一起组织和领导全市工人总罢工。他主持制定了《上海总工会组织条例》，建立“处-科-干事”三级架构，使25万罢工工人实现了有序管理。

因为罢工，资本家断绝了工人的工资来源，面对工人的实际困难，刘少奇推动成立救济委员会，短短两个月筹集100余万元救济款，首创“按工龄发放补贴”“伤病工人特别救助”等制度，切实保障了罢工工人的基本生活，为五卅

运动能够坚持斗争长达三个多月之久，打下了牢固的经济基础。

刘少奇不仅往返各救济团体之间积极筹措募捐款，甚至深入到罢工工人家中，了解工人的实际生活状况。他还亲自把救济款发放给参加罢工的电车工人和英商厂的工人，解除了工人在罢工期间的后顾之忧。

党史学者指出：“刘少奇的贡献在于将工会从‘抗议组织’转变为‘治理主体’，为中国工运的制度化发展奠定了基础。”上海工会管理职业学院副院长邹卫民分析，刘少奇的组织条例为后来苏区工会建设提供了范本，其救济机制直接影响了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的制定。

当反动派对总工会污蔑“贪污救济款”时，刘少奇还展现出超越时代的治理智慧。他主动邀请上海著名会计师徐永祚，对30余万笔捐款进行逐一审计，并在《申报》《民国日报》公布详细账目，附上审计报告全文。这一在当时堪称“破天荒”的举动，迅速平息了舆论质疑，树立了工会组织的公信力。有学者在研究中注意到，刘少奇的审计实践启发了公共租界工部局后续的财务管理制度改革，这种“以斗争促进步”的效应成为五卅运动对近代中国社会治理的隐性贡献。（摘自《新民周刊》2025年第19期）

冯玉祥在张家口

·王锋·

冯玉祥在1925年和1933年两度来到张家口，这两段交织着铁血与理想、困境与突围的岁月，重塑了其人生轨迹。

从军阀向革命者蜕变

1924年北京政变后，面对张作霖奉系军阀的威逼与段祺瑞政府的权术围困，冯玉祥接受李大钊与国民党左派的政治启蒙，于次年1月13日就任西北边防督办。当他踏上张家口桥东土尔沟（今德胜街45号）的小路，名为“爱吾庐”的灰瓦院落，见证了冯玉祥从旧式军人到国民革命将领的思想蜕变。在这里，冯玉祥先后接待过李大钊、董必武、李烈钧、于右任、孙科、吴稚晖、徐谦、邵力子和苏联代表鲍罗廷等人。李大钊更是多次与他会晤，做了大量思想工作，冯玉祥的思想逐渐转向国民革命，最终举起“联俄联共”的大旗。

1925年2月27日，冯玉祥派机要秘书尹心田护送夫人李德全携带着他的亲笔信从张家口匆匆赶往北京，探望病重的孙中山。彼时孙中山已无法多言，却仍嘱托孙科将《三民主义》《建国大纲》《建国方略》等著作共8000册赠予冯玉

祥。尹心田回忆，这批书籍运回张家口后，冯玉祥“如获至宝”，当即下令分发全军研读，甚至因数量不足而重印补发。孙中山的临终遗赠，恰似一粒火种，点燃了冯玉祥从军阀向革命者的蜕变。

军事改革率先在这座边城展开。冯玉祥开创了西北军的政治工作，建立军人俱乐部、成立学习小组、宣传三民主义。苏联顾问团按照冯玉祥的要求，帮助开办了骑兵学校、炮兵学校、机关枪学校、钢甲车学校等各种军事学校。他创办的西北军干部学校，收容因参加五卅运动被开除的学生，培养兼具军事与政治素养的新式军官。这种“军政并重”的模式，为后来的国民革命军北伐奠定了基础。

1925年西北银行的创办是冯玉祥地方治理的破局之举。这座诞生于张家口的金融机构，既为西北军提供军费支持，又以贷款扶持工商、发行“西北券”统一货币流通。尽管西北银行最终因战乱陷入信用危机，但它打破了传统军阀单纯依赖征税和劫掠的财政模式，展现出近代化金融体系的雏形。

打响华北抗战第一枪

1933年5月，当日寇铁蹄踏破热河长城，蛰伏多年的冯玉祥在民族危亡时刻选择回归。在水母宫潮湿的指挥部里，这位年过半百的将军，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组建“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在这座见证过他理想的边城，打响华北抗战第一枪。

这支由冯玉祥任总司令、方振武任前敌总司令、吉鸿昌任前敌总指挥的部队，在没有飞机坦克、缺乏后勤补给的绝境中，快速收复康保、宝昌、沽源，又经过五天血战夺回多伦，守城日军铃木旅团遗尸600余具仓皇北遁，这是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军队首次收复失地。当南京政府以“破坏国策”为由断粮截械，抗日同盟军纪念塔上镌刻的312名阵亡者姓名已成为最后的丰碑。

对冯玉祥而言，张家口是淬炼其精神的双重熔炉。20世纪20年代在此萌发变革星火；1933年在此迸射抗日惊雷，让“倒戈将军”完成了向周恩来所誉“坚定的民主主义战士”的蜕变。（摘自5月1日《团结报》）